

黃霖 編著

文心雕龍彙評



上海古籍出版社

3.2
5-2

I206.2
H855-2

父心雕龍彙評

霖
編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Q076/03

I206.2

H855-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心雕龙汇评/黄霖编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6

ISBN 7-5325-4086-3

I. 文... II. 黄... III. 文心雕龙—文学评论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0361 号

文心雕龙汇评

黄霖 编著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 上海先锋装订厂装订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9.5 插页 8 字数 250,000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500

ISBN 7-5325-4086-3

I·1797 定价: 25.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文心雕龍批評音註序

彥和之為此書也濬發靈心而以雕龍
自命末篇序志垂夢聖人意蓋鴻遠
前乎此者有魏文之典陸機之賦摯
虞之論並為執苑懸衡彥和囊舉而
獄寃之疏淪詞源博裁意匠既敘風雅
揚耀古今允哉述作之金科又章之玉

古文
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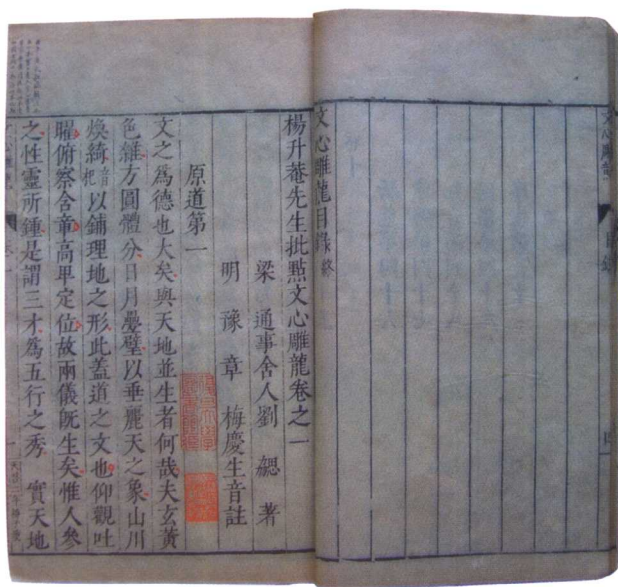
梅庆生万历己酉音注本
《杨升庵先生批点文心雕龙》

文心雕龍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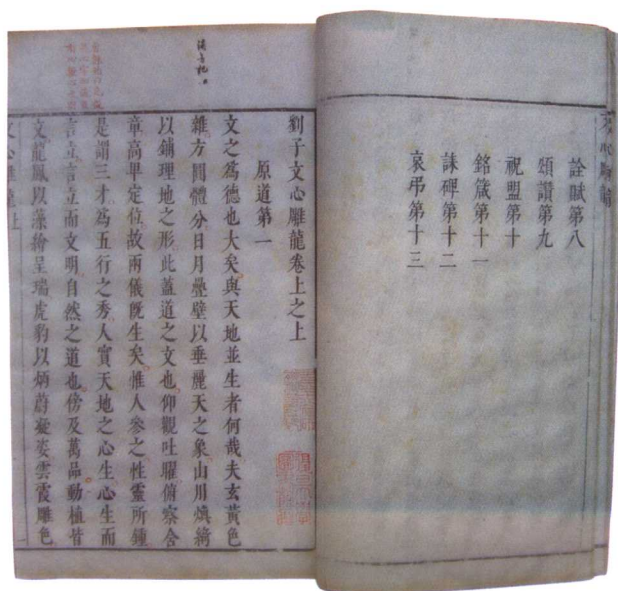
明姜午生譔

若劉子者可謂深乎文
者也故未始不終篇而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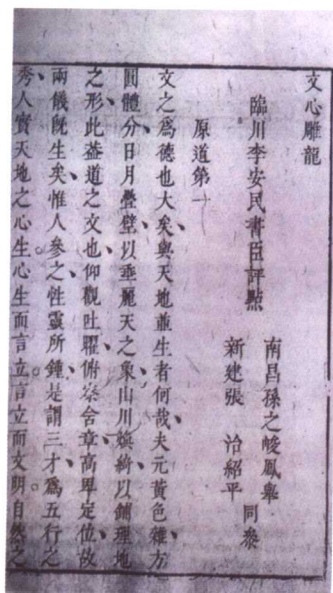
姜午生覆刻梅庆生万历音注本
《杨升庵先生批点文心雕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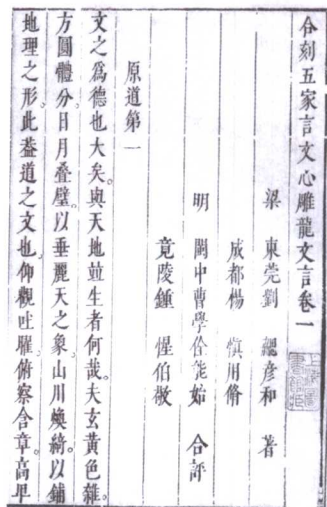
梅庆生天启二年第六次校定后重修本
《杨升庵先生批点文心雕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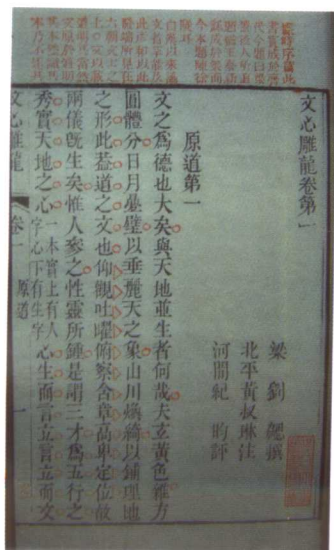
凌云五色套印本《刘子文心雕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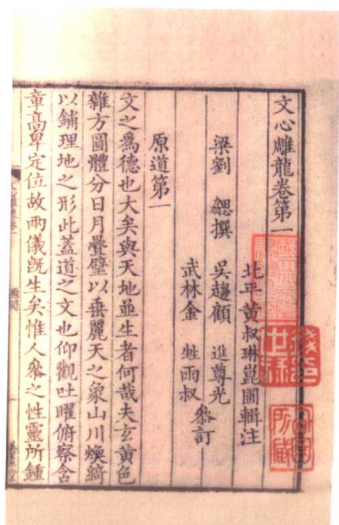
李安民批点本《文心雕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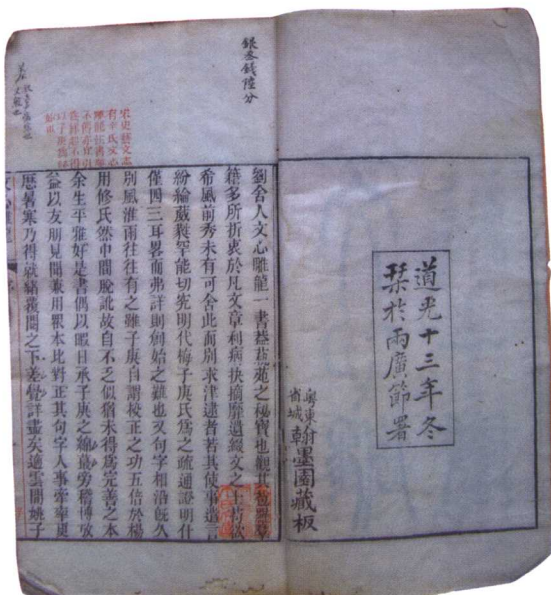
钟惺合刻五家言本《文心雕龙》



芸香堂套印本纪昀评《文心雕龙》



养素堂本黄叔琳辑注《文心雕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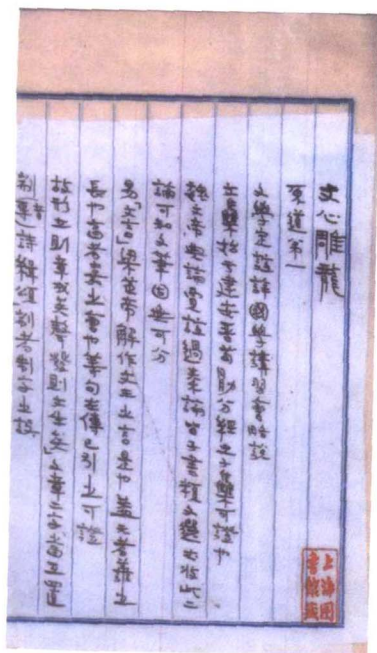
翰墨園套印本紀昀評《文心雕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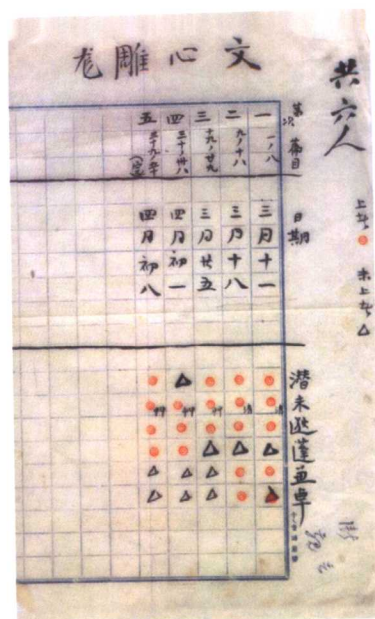
张松孙辑注本《文心雕龙》



章太炎《文心雕龙札记》纪录稿



章太炎《文学定谊论国学讲习会略说》纪录稿



章太炎讲授《文心雕龙》听课表



叶瀚《文心雕龙私记》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学论略

(代前言)

上世纪二十年代起,在中国的文学界出现了“中国文学批评”及“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概念^①,明确而自觉地将中国古代的文论著作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逐步建立起了一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科。时至今日,我们溯流探源,不能不觉得大致从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序》针对班固《离骚序》的批评起^②,到刘勰对于“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场《文论》、陆机《文赋》、仲治《流别》、弘範《翰林》”等一一作出评判(《文心雕龙·序志》),再到本世纪初刘师培、黄侃等对于《文心雕龙》作专门的研究,实际上也存在着一个以“诗文评”为主要批评、研究对象的历史过程^③。当然,中国古代的这种研究,比起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来说,难免显得在态度上不够自觉,在观念上不太明确,在形式上比较稚拙,但它毕竟自有其特色和多彩的内容,且也有其轨迹可寻。它作为一种古典形态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学,也该到我们加以认真研究和总结的时候了。

—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学的研究形态,大致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形而下”的、在文献学范围的实证性研究;另一类是“形而上”

的、以经史观主导的理论性批评。

在实证性的研究中,当然以目录学方面的著作首先引起人们的关注。这是由于传统的学问往往在目录学中得到敏感而富有代表意义的反映,所谓“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类例既分,学术自明”(郑樵《通志·校讎略》),同时也由于有关实证性的古代文评的研究在目录学的著作中相对比较集中,因而它容易成为人们探寻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学的入口。彭玉平、吴承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④,正是从这里入手,将中国古代对文学批评的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作了具有开创意义的探讨。今随其后,对这一问题略作梳理。

大凡从《文心雕龙》、《诗品》等文论专著问世,《隋书·经籍志》始把它们归入集部之后,传统的目录著作虽然一直把文学批评著作作为集部的一个分支,但随着文评著作的不断丰富、人们认识的深化,其分类和评论也逐步趋于细密和科学。从分类的角度来看,大致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归入“总集”类的阶段。《汉书·艺文志》时代,主要是一些诗赋作家的个人创作集,所以其《诗赋略》只是按赋、诗两类来著录作品。“建安以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于是继挚虞《流别》之后,“又集总钞”,出现了诸如《文选》、《玉台新咏》等不少“总集”,成为“属辞之士”取法的宝库。这样的创作现实,使《隋书·经籍志》的编者不得不考虑在集部中另辟“总集”一类。但与此同时,编者也注意到又新出了一些如《文心雕龙》、《诗品》“解释评论”性的作品,与创作性的集子有所不同,但由于当时这些论著毕竟数量极少,还难以自立一门,又它们都论及了大量的作品,与“总集”相对比较接近,于是就在“总集”中“并解释评论”,归成一类。目录学上的这一分类现象,正说明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学刚刚破土而还未成气候,但它毕竟标志着从无到有的飞跃。

第二个阶段是分入“文史”类的阶段。至唐代,随着《史通》之类的史评著作的出现和诗格文评之作的日见增多,人们越来越认

识到“解释评论”性的著作与创作性的作品不同,且数量之富也实难再由“总集”来加以牢笼,于是又在总集类中明确地析出“文史”一门。据宋王应麟《玉海》卷五十二“唐开元著录 四类 开元经籍”条载,唐开元年间始将集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并文史”。至宋代,目前我们能见到的如《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辑补)、《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等都有“文史”一门。如《新唐书·艺文志》的“文史”类就著录了李充《翰林论》、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评》、刘子玄《史通》、皎然《诗式》、王昌龄《诗格》、范传正《赋诀》、孙邠《文格》等二十七部著作。后来个别的目录学家(如郑樵《通志》)又在“文史”中另析出“诗评”一门,以将诗话、诗格类著作与综论各体文史的论著分开,或者如章如愚的《山堂考索》那样将“文史”分成“文章缘起”、“评文”、“评诗”三类。他们尽管注意到了诗与文的区别,但都忽略了文与史的不同,故在实质上尚未超脱“文史”的范围。这一阶段的主要意义就在于理论批评真正从文学创作中分离出来,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学的第二次飞跃。

第三个阶段是“诗文评”独立的阶段。王重民在《校讎通义通解》中说:“唐宋目录中的文史类,明清又区分为史评类与文评类,指历史与文艺的批评书籍。”明人的一些书目如《国史经籍志》、《澹生堂藏书目》等面对着唐宋以来大量的诗话文评著作,吸取了宋人编目的体例,开始将“诗文评”专门独立了出来,将文学批评与历史批评分家。这实际上标志着古代文学批评史学的第三次飞跃。后到清代《四库全书》编定,“诗文评”在一般意义上就成了古代文学批评的专称。

古代文学批评著作在古代书目集部的分类中从“总集”——“总集文史”——“诗文评”的渐进,标志着人们对于这门学科的逐步的认可和认识的深化。它说明了文学批评这门学科尽管与文学创作、历史批评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它毕竟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经过几次认识上的分化和飞跃,人们终于抓住了这门学科的特性,

也就标志着这门学科的最终成立。

目录学著作的分类,虽然渗透着目录学家对于这门学科的认识,但毕竟不能直接窥见他们对于文论著作的具体批评;而目录著作的提要功能,则使目录学家同时又以文学批评史家的姿态出现,对文学批评著作作出直接而具体的批评。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目录学的著作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几乎可以说,仅就古代的一些目录学著作,也可简单地勾勒出一个具体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轮廓。这个轮廓大致也可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著录概况的阶段。这时一般只是在著录的著作下面以最简略的文字记录其卷数及作者的时代、姓名等,还没有批评性的文字。如《隋书·经籍志》著录《文心雕龙》时只注明:“十卷,梁兼东宫通事舍人刘勰撰。”著录《诗品》曰:“《诗评》,三卷,钟嵘撰。或曰《诗品》。”这只是研究古代文学批评著作的最初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简单评论的阶段。至唐代,书目提要之风渐开。据记载,如规模浩大的《群书四部录》、《古今书录》等,每书都有解题,每卷有小序,体例完备,可惜均佚。宋代有解题的大型官修书目《崇文总目》、《中兴馆阁书目》等也都亡佚,今天只能在后人的辑补中略见一斑,查《崇文总目辑释补正》一书,所附“文史类”各书未见提要;而《中兴馆阁书目辑考》所辑原书提要也较简略,如《诗评》下仅释:“自汉以来能诗者一百二十二人,分三品为评。”《翰林论》下释:“凡二十八篇,论为文体要。”都未见评论。由于未睹这些书目的全貌,故无法对它们作出全面而正确的评价。今从保存完整的私家书目《直斋书录解题》来看,或许能看到当时一些解题的大致情况。此书卷二十二“文史类”中有关文学批评著作的解题,有一些仍是停留在著录概况的水平上,如录“《文心雕龙》十卷”曰:“梁通事舍人东莞刘勰彦和撰。勰后为沙门,名慧地。”这比起《隋书·经籍志》来,虽然丰富了若干有关名里、事迹的内容,但毕竟未曾跳出一般地介绍作者概况的范畴。有的解题,也如《中兴馆阁书目》那样,对书的内容有所概括或提示,如“《文章缘起》一卷”解题

道：“梁太常卿任昉彦昇撰，但取秦汉以来，不及六经。”“《诗品》三卷”解题道：“梁记室参军颍川钟嵘仲伟撰，以古今作者为三品而评之，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六十九人。”再进一步，就对一些著作的文学批评直接发表了批评性的意见，最典型的是关于《文章元妙》的解题：

唐任藩撰。言作诗声病、对偶之类。凡世传诗格，大率相似。余尝书其末云：论诗而若此，岂复有诗矣。唐末诗格污下，其一时名人著论传后乃尔，欲求高尚，岂可得哉！

又，“《唐诗主客图》一卷”解题云：

唐张为撰。所谓主者：白居易、孟云卿、李益、鲍溶、孟郊、武元衡，各有标目，余有升堂、及门、入室之殊，皆所谓客也。

近世诗派之说，殆出于此，要皆有未然者。

这两则解题，不但都对诗论本身的得失作出了批评，而且与整个时代的理论风气联系了起来，虽然比较简单，但可以说已走进了文学批评史的领域。像《直斋书录解题》这样的书目，直至明清时代还有相当的一批。不过，它们虽然涉及了对于中国文学批评的批评和研究的诸多方面，但总的说来随意性比较大，评论和研究性的文字也比较简单，可以说还没有自觉而明确地进入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的状态。

第三个阶段是全面研究的阶段。这是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代表。这部书目的“诗文评类”正选著作六十四部，存目著作八十五部，几乎网罗了中国古代诗文批评方面的重要论著。其卷首小序曰：

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于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棻《本事诗》，旁采故实；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

宋明两代，好为议论，所撰尤繁。虽宋人务求深解，多穿凿之词；明人喜作高谈，多虚僞之论；然汰除糟粕，采擷菁英，每足以考证旧闻，触发新意。《隋志》附总集之内，《唐书》以下则并于集部之末。别立此门，岂非以其讨论瑕瑜，别裁真伪，博参广考，亦有裨于文章欤？

这段短论，言简意赅，高屋建瓴，实可视之为一篇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学的大纲。它论述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学的产生、发展和主要形态，批评了宋、明两代文论的短长得失，指出了研究中国文学批评的意义，以及这门学科的发展反映在目录学上的变化，几乎囊括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在此基础上，书目对每一部诗文评著作进行了认真的批评。这些批评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一、批评的态度上坚持实事求是，反对片面之词，反对过头之论，反对门户之见。如它评钟嵘《诗品》论汉魏以来五言诗人的优劣时说：“皆妙达文理，可与《文心雕龙》并称”，给予极高的评价。但它同时又指出《诗品》“论某人源出某人者，一一亲见其师承者，则不免附会”，不是说好好到底，说坏坏到头，顾其一点，不及其馀。在论及后人对于《沧浪诗话》的评价时，它严肃地批评了“誉者太过，毁者亦太过”的不良倾向，结合了严羽当时的诗坛风气，正确地评价了“取盛唐为宗，主于妙悟”说的理论意义。在《临汉隐居诗话》、《石林诗话》等解题中，列举了大量的事例，尖锐地批评了作者“坚执门户之私，而甘与公议相左”的不正确态度。而难能可贵的是，《总目》即使对于这类批评家也并没有因此而全面否定，还是采取了“略其所短，取其所长”的态度，将它们“门户之私”与“精核之论”区别开来，“分别观之”，从而公允地肯定了它们的价值所在。

二、批评的标准上注意文学特点。《总目》作为“钦定”的官修著作，当然以儒家正统的经史观作为其主导的思想，如其赞扬《文章精义》“论文多原本六经，不屑屑于声律章句”，肯定《岁寒堂诗话》论诗“始明言志之义，而终之以无邪之旨，可谓不诡于正者”，都

表现得十分明显。这种现象完全可以理解。在这里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总目》并不僵化地以封建教条作为文学批评的唯一标准，而是能尊重文学的特点和创作的规律。像《沧浪诗话》、《二十四诗品》这一类侧重于阐发创作奥秘和艺术风格的著作，同样得到了高度的赞许，认为严羽之论“以救一时之弊者”，司空图“味在酸咸之外”的说法“深解诗理”。相反，假如“所论多作理语”，以理学来论诗评文就不足为训。它批评《馀冬诗话》“以讲学之见论文，已不能得文外之致；至以讲学之见论诗，益去之千里矣”，就清楚地表明了《总目》还是以文学性作为批评的主要标准。

三、批评的方法上注意知人论世，重视评论与考证相结合。《总目》中的提要十分注重介绍作者的生活时代、名号爵里、有关事迹，以及著作版本等情况，乃至花不少篇幅进行必要的考证。这就为正确的评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比如在评《中山诗话》时，《总目》指出，其作者刘攽“以博洽名一世”，故“元祐诸人之中学问最有根柢，其考证论议，可取者多，究非江湖末派钩棘字句以空谈说诗者比也”。同时又指出其书有“所载嘲谑之词尤为冗杂”之病，这是与作者性“好诙谐”有关，甚至能具体地指出他因此而被人所弹。这样的评论，使人读来有一种脚踏实地之感。《总目》重视论人，但不因人论文。它认为司马光“德行功业，冠绝一代，非斤斤于词章之末者”，其“品第诸诗，乃极精严”，但同时也指出其《续诗话》也有“不可解”之处。相反，如《优古堂诗话》的作者是一个误国奸臣，“其人本不足取”，但仍肯定其诗话“颇有可采”，“不为无益”，并不一笔抹杀。总之，其批评方法并不死板而走极端，而是往往能虑及多方，照顾全面。

综观《总目》“诗文评”的小序和各篇提要，的确使人感到作者们对于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著作进行了全面、系统、认真的研究，已经自觉地把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当作一门专门的学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总目》的“诗文评”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学正在走向成熟。

二

在文献学范围研究中,目录学方面的著述固然最具代表性,且数量也最为丰富,但毕竟并未能包括全部。我们同时也应该注意在注释、校勘、辨伪、编辑等诸多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有关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研究。

比较起来,对于文论著作的注释工作做得最早。汉人解经,就涉及到一些现在看来属于文论方面的作品。至《典论·论文》、《文赋》、《文心雕龙》、《诗品》等出,特别是用骈文所写的《文赋》与《文心雕龙》,字义深奥,一般人难以读解,于是对它们的笺注解说明就应运而生。《典论·论文》与《文赋》作为《昭明文选》中的一种,较早地见于《文选》的注本中。可惜最早的《文选》注本《文选音》已佚,今见唐代李善注、五臣注后有不少注本,对疏通《典论·论文》、《文赋》的事义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其中李善注尤负盛名。今以《文赋》李善注为例,它不只是对本文的一些字义作了直接的注解和引用了大量的前人说法以笺证,而且在理解作者的创作精神和整篇文意的基础上作了必要的引申和解说,如在“或仰逼于先条,或俯侵于后章”下注曰:“《广雅》曰:‘条,科条也。’凡为文之体,先后皆须意别;不能者,则有此累。”这里前一句是引《广雅》以解释“条”字,而后一句则是在理解文意的基础上,作了正面的阐述,实际上也是表达了注者自己的看法。在正文前,注者又摘录了有关《文赋》作者生平和创作的背景材料。这都说明了李善的注不是泛泛之作,而是在花工夫、作研究的基础上所做的工作。

有关文学批评著作的注释,在《文心雕龙》的研究史上表现得较多且较有代表性。据《宋史·艺文志》载,宋代就有辛处信作《文心雕龙注》十卷。今见《玉海》、《困学纪闻》所引的《文心雕龙》多有注,很可能即是辛注。明清两代,有多种注本,以梅庆生、黄叔琳注最为有名。梅庆生音注本初刻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至天启二